

王鐸書贈湯若望詩翰研究

兼論清初貳臣與耶穌會士的交往

黃一農

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

〔內容提要〕：筆者在輔仁大學神學院發現一題為王鐸（一五九三—一六五二）贈湯若望詩翰的條幅，經考證後證實此並非王氏的真跡，很有可能是陳垣嚮搨以便印送友人流傳的底本，而陳氏在嚮搨時曾將原先的冊頁格式改成了條幅。

由王鐸的生平事跡判斷，此一詩翰應是在順治二至四年間書於北京，他當時在貧病交加的情形下，寫錄舊詩數首贈給已成新貴的湯若望，希冀能在別離多年之後，再續先前的交往，而王鐸在跋中對自己窮困景況的描寫，或亦有期盼湯氏賙濟的間接目的。

入清後，漢化已深的湯若望因獲派管欽天監監正事，而很快地成為貳臣群體中的重要份子，此故王鐸的文友們亦留有不少酬贈湯若望的詩文。但對王鐸或當時許多漢官而言，湯若望最被認同的形象，應是一盡忠職守的同僚，或是一學行俱佳的高士，而非一汲汲於度人的傳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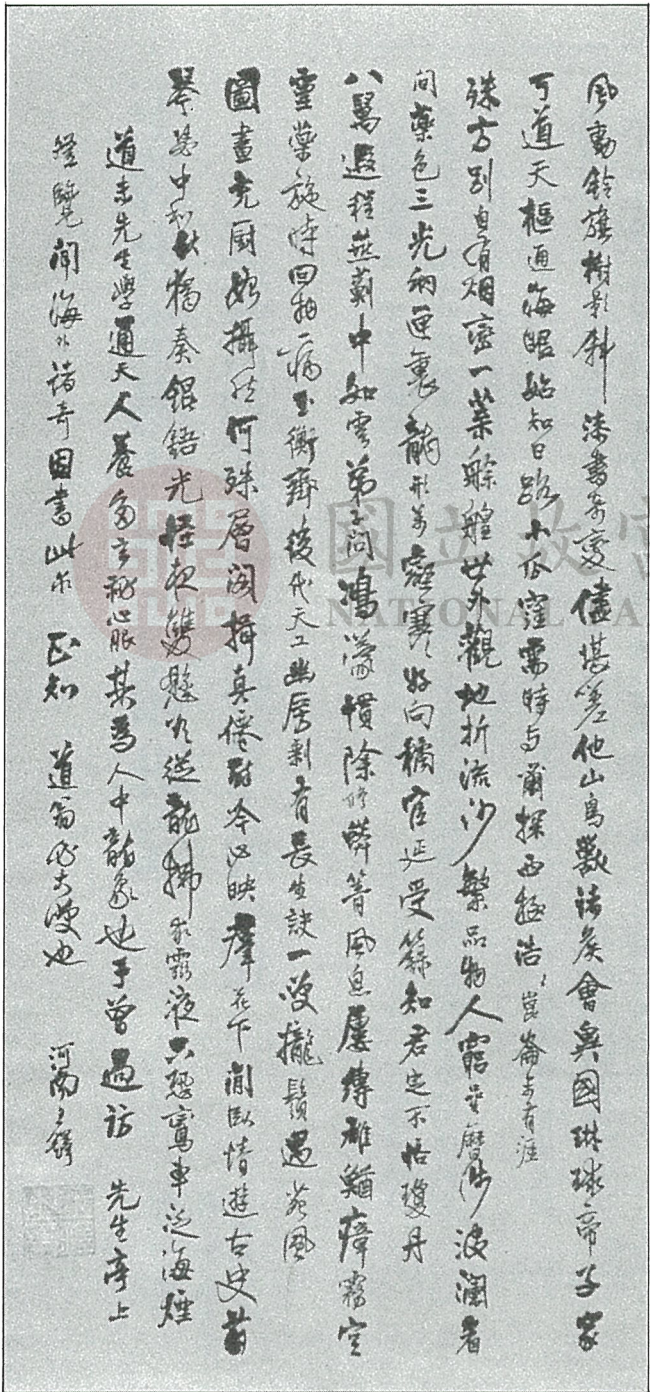
一、前言

筆者近在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見到一題為王鐸（一五九三—一六五二）所書的行書條幅，其旁並黏貼有「王覺斯

贈湯若望詩翰，陳垣署檢」一紙（圖一）。王鐸，河南孟津人，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十樵、癡僊道人、煙潭漁叟等，曾仕明清兩朝為高官。

王鐸的書法宗魏晉，與董其昌齊名，明末即有以「南董北王」併稱二人者【註一】，時人彭而述亦贊其曰：「海內之知先生者，止知其工書，以為掩晉人而上之，真行草三百年書法之大成，而篆籀八分則上蔡中郎（筆者按：指東漢蔡邕），猶且居為難弟，世鮮知之者」【註二】。王鐸的詩同樣名重當代，如彭志古嘗謂：「長安以詩名者為王先生覺斯、劉先生憲石（筆者按：指劉正宗）暨吾行屋薛夫子（筆者按：指薛所蘊），所謂三大家者也」【註三】，而為其編選《擬山園選集》的黃道周，更極稱王鐸為當時四大詩家之首【註四】。

圖一：輔仁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所藏之王鐸贈湯若望詩翰條幅



由於筆者近年來一直有志於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此一條幅原藏天主教會所屬的上海徐家匯藏書樓，題署的陳垣又為近代治天主教傳華史的泰斗之一，故對此一由王鐸書贈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一五九二—一六六六）的詩翰，備感興趣。本文即嘗試析究此一字跡的真偽，以及王鐸書就此詩的時間、背景和目的，並希望能進而對漢人士大夫們與湯若望交游的心態，有較深入的探討。

二、王鐸生平事跡簡述

由於後文的討論涉及王鐸的家庭狀況和宦游事跡，故筆者先在此節中作一綜合性的闡述【註五】。王鐸生於萬曆二十年壬辰歲【註六】，目前幾乎所有的學者均將之換算成公元一五九二年，然而筆者在其所書的〈柏香帖〉中，見有一題記，謂其曾於「己卯初度日」應琉球丞相蔡堅之請而作詩書贈【註七】，由於蔡堅是在崇禎十三年（己卯歲）十二月三日始入貢的【註八】，因知王鐸的生日（即初度日）必晚於此，換算成西曆則已為一五九三年的年初。王鐸於天啟二年（一六二二）中進士後，即入翰林院，四年，授檢討【註九】，五年，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初，召至北京為詹事。十一年，任東宮侍班【註十】，七月，遷禮部右侍郎。十三年九月，陞授南京禮部尚書，但任職未久，即於十一月因丁父憂而辭官【註十一】。十五年，李自成陷孟津，在鄉丁艱的王鐸因避難乃率家人南遷，其妻馬氏不幸於途中病故【註十二】。十六年三月，王鐸一家別離在江蘇吳縣西北泖墅關的友人袁樞後，又南下至吳、越、楚等地，同年初，經湖北一帶返回孟津，然因故里已室家無存，遂避地河南輝縣【註十三】。十七年年初，又移居河南濬縣劉尚信的攝生閣【註十四】，三月，王鐸重被起為禮部尚書【註十五】，但尚未赴職，李自成已陷北京。

崇禎十七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召姜曰廣、王鐸為東閣大學士，但鐸還未履新，姜氏即遭劾去，並由馬士英接任首輔，鐸至後，仍為次輔。六月，其弟鏞、子無黨俱因扈衛福王有功，世襲錦衣指揮使。八月，加太子少保。十月，鏞和無黨又以護送太后自河南來南京之功，授世襲指揮。弘光元年（即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正月，加少保，廢子鏞衣指揮。二月，加少傅。三月，有一自稱太子者抵南京，在馬士英的指使之下，曾任東宮侍班的王鐸，力斥其為假冒，此事頗為時人

或後人所嚴責【註十六】。五月，清兵將至，弘光帝出狩，南京城內大亂，有趙姓監生率百姓擁立遭監禁的「太子」，王鐸於是被擒捉，在群毆之下，連鬚髮亦幾乎被拔盡，但隨即為「太子」所釋，仍為大學士。

順治二年五月，多鐸克南京，王鐸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官員數百人奉表投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在清廷的籠絡之下，王鐸以原禮部尚書銜管內翰林弘文院學士事【註十七】，並充《明史》副總裁。六月，獲賜紗蟒朝衣一襲【註十八】。四年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註十九】。五年閏四月，因其妾段氏病故，曾一度返里【註二十】。十月，以恩詔加太子太保。八年，晉少保。九年二月，奉派祭告西嶽，事竣乞假歸里。三月，實授禮部尚書，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左副都御史事，但尚未履任，即卒於家【註二一】，遂贈太保，諡文安。

據文獻中所記，王鐸至少生子十人、女六人，其中名字可考之子，有無黨、無咎、無愆、無回、無技、無頤、無爭和無据等八人，但無愆後過繼與鐸弟鏞，無技卒於王鐸「過五十」之時，無爭和無据均夭折【註二三】。至於六女當中，有兩女同在崇禎十一年病故，第三女亦早殤【註二四】，一女嫁給張鼎延之子【註二五】，一女嫁給楊嗣修之子【註二六】，另一女則嫁與呂維祺之子【註二七】。王鐸各個子女的生年多不詳，僅知其在逾五十歲時，仍有子女年幼【註二八】。

王鐸家族在南明朝廷中雖備受恩寵，但自順治二年起，他們一家就開始在清廷中汲汲於仕途，其弟鏞、鏞、鏞均考取拔貢，其中鏞和鏞分別歷官至浙江金衢嚴道參議和刑部河南司員外郎，鏞則隨多鐸南征有功，授蘇州知府，後調太平知府。王鐸長子無黨亦以拔貢歷官至濟南道參政，並曾在平定大同總兵姜瓖起兵叛清一役中立戰功。次子無咎則於順治三年參加清朝入主中原以來的首次殿試，並高中進士，嘗在舟山一役中立戰功，後歷官至太常寺少卿。其他子姪出仕或蔭官者也頗多【註二九】。

王鐸雖以其書藝和詩文聞名於當世，但其人品和官聲，在清初即屢為人所詬病，如談遷在《棗林雜俎》中嘗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張怡的《諛聞續筆》亦稱：「王孟津鐸以翰墨有聲，然略不知經濟，既入相，昏瞶益甚」；王弘在《山志》中稱：「宗伯於書道，天分既優，用工又博，合者直可抗跡顏、柳。晚年為人略無行，簡書亦漸入惡趣……乃知書品與人品，相為表裏，不可掩也」；吳德旋在《初月樓論書隨筆》中嘗曰：「王覺斯人品頹喪，

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陸隴其在《三魚堂日記》中記稱：「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誥命，乃其所自作，極其贊美，當時風氣至于如此，況復刻之集中，恬不為怪，真可駭異」。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王鐸在仕清時所以無著績，乃因其對新朝採取一消極態度所致，此故在乾隆間敕修的《貳臣傳》中，他即被列入乙編，而此編大多記的是「進退無據、謬托保身」之人【註三十】。這一說法也可從清廷在纂修《四庫全書》時，對王鐸著作所持的拒斥態度，得到部分印證，如周在浚編選的《賴古堂尺牘藏棄集》一書，即因收有王鐸和錢謙益的尺牘，而被列入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山東奏繳的應禁書目中【註三二】。而錢謙益在為王鐸所撰的墓誌銘中，也將其比擬成叔孫昭子和魏公子無忌，稱其降清乃因有所圖謀，惟有學者認為錢謙益此文有拔高其同為貳臣的好友之嫌【註三三】。

王鐸出身在一家道中落的耕讀家庭中，他年少時曾「衣食為艱」【註三三】，而據其友的回憶，他初授翰林時，「一廬四壁，子無長物，唯書充棟」【註三四】。即使到中年以後，王鐸的家境亦常相當窘困，知其在四十歲時寫給親家張鼎延的《絕糧帖》一信中，有云：

弟每逢絕糧，室人四詆……親家猶不土視貧時交，令蒼頭搽豚蹄、床頭醞，為弟空盤中增此薌脯，為空腹兼味也，況前之佐以俸錢耶【註三五】！

或許直至崇禎十年擔任京官以後，王鐸的景況始逐漸好轉。

但王鐸在明廷中為官多年的積蓄，於清兵攻南京之際，損失殆盡，導致他在降清初期生活十分艱苦。即使自順治三年正月起，他已獲派管內翰林弘文院學士事，然而此一閒官的俸給或亦不豐，此故王鐸當時即屢於所居的琅華館中為人書寫字帖或作畫（參見附錄二），以添補家用。順治三年七月和四年十月，王鐸也曾兩度為友人臨柳公權帖，並有意寫錄其中「儻有赤箭時，寄及三五兩，以扶衰病，便是厚惠」句，以求取酬贈【註三六】。

王鐸有一首題為《初夏月囊空偶識》的詩，或即作於此時：

入夏仍寒憐北地，青錢已盡始愁飢。

時難暗去鄰居喜，書客不來童僕疑。

欲買山松心鬱結，縱頒官米總參差。

故林也有東南畝，何日汙邪滿舊菑【註三七】

由其中的「縱頒官米總參差」句，顯示當時發放官俸的時間往往稽延，乃至於有「青錢已盡始愁飢」的窘況。而從「書客不來童僕疑」句，我們知道他當時的生活頗依賴潤筆的收入。

王鐸另一首題為〈絕糧〉的詩，也可能是這段時期的作品，其附題稱「時以自作畫貿易，戲書北牆」，詩中有云：

忍饑讀書坐官舍，故園畫冊散如煙。

睡眼昏迷過春夏，每日字畫亦可憐。

白髮休吟蜀道篇，僮牛牧豨不獨我。

古來磊砢之士胡不然，嗚呼只愁雪裏無人買。

雲水蒼山不直錢【註三八】！

做為一位貧困潦倒的學士，王鐸只得「忍饑讀書坐官舍」，而其所繪的「雲水蒼山」，在此戰亂稍息之際，顯然請索之人並不多，且亦值不了幾多錢。

又，由王鐸〈無錢行〉一詩中所稱的「交謫室人晨爨窘，羞言囊底無一錢，己丑之春陰風吼……：昨年忍饑病纒蘇，吟詩作畫慰窮途」【註三九】，可見他至順治六年時，經濟狀況仍然窘困。但從其友錢謙益所指他在仕清之後放蕩聲色的敘述【註四十】，知其在去世之前兩、三年的景況，似乎已大見改善。

三、輔大所藏王鐸贈湯若望詩翰的真偽

輔大所藏王鐸贈湯若望的詩翰，共書七言律詩四首，其文曰：

風動鈴旗樹影斜，漆書奇變儘堪嗟【註四一】。

他山鳥獸諸侯會，異國琳球帝子家【註四二】。

可道天樞通海眼，始知日路小瓜窪。

需時與爾探西極，浩浩崑崙未有涯。

殊方別自有煙巒，一葉餘腥世外觀【註四三】。

地折流沙繁品物，人窮星曆涉波瀾。

眉間藥色三光納，匣裏龍形萬壑寒【註四四】。

好向橘官延受籙【註四五】，知君定不吝瓊丹。

八萬遐程燕薊中，如雲弟子問鴻濛【註四六】。

慣除修蟒箐風息，屢縛雄鱗瘴霧空。

靈藥施時回物病，玉衡齊後代天工【註四七】。

幽房剩有長生訣，一笑攏鬚遇苑風【註四八】。

圖畫充廚始攝然【註四九】，何殊層閣揖真僊。

醉吟心映群花下，閒卧情遊古史前。

琴瑟中和秋獨奏【註五十】，錕鋹光怪夜雙懸【註五一】。

欲從龍拂求靈液，只恐鸞車泛海煙。

末尾則題曰：「道末先生學通天人，養多玄祕，心服其為人中龍象也。予曾過訪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因書此求正，知道翁必大笑也，河南王鐸」，下並鈐有「王鐸之印」乙方。

王鐸在前詩當中，除了天算之外，對西藥尤其心折，此或與其個人的興趣有關。如他曾作〈種藥〉一詩，其中有云：「隙地理良苗，不如藝藥徑。督僕區別之，方類皆有定……」，而在〈觸言〉一詩中亦有「種藥南巖下」句【註五二】，顯示他對藥學的旁涉是相當深。他甚至在〈少年歌〉中，嘗與「白眼空為二品官，何如賣藥箕山道」之慨【註五三】。

由於王鐸的書法對日本昭和後期的書風影響甚大，並因此形成一名為「明清調」的派別【註五四】，故日本書法界對王氏

一直保持極大興趣，二玄社除請村上三島編纂了《王鐸の書法》五大冊，將其傳世的重要作品全數加以輯錄外，甚至還於一九八八年出版伊藤松濤所編的《王鐸字典》。而在《王鐸の書法·冊篇》中，即收入了王鐸書贈湯若望的詩翰，但很有趣地，其格式卻是冊頁而非輔大所藏的條幅。

經比較此兩幅詩翰墨跡後，發現其中各字的形狀，甚至筆畫粗細和字體大小的比例均無一不似，此一結果即使是由同一人連續書寫兩次，都無可能達成，兩者顯然應出自同源，且頂多只有一幅為真跡。

由於冊頁中所包含的文字內容，與條幅中詳略有別，現先細述之。此一冊頁之首有標題曰：「過訪道未湯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註五五】，條幅中則缺此。又，冊頁第二首的正文中，漏書「形萬」二字，而在此首之末，則補書有「形萬」二字落」等字。另外，在贈湯若望的四首律詩之後，冊頁中還書有其它四首七律：

〈夜中言〉

茫茫四海欲安之，鄉國哭歌正此時。

有客自尋蕭寺隱，故人還寄草堂詩。

舊年觀弈方知宦，今日梳頭不惡絲。

五嶽胸中何必起，蒙莊曳尾是誰師【註五六】

〈即吾園示僧〉

半載龍岡如老衲，獼猴園即是吾園。

秋深花落知溪晚，冬後鷓鴣鳴覺樹喧。

生死靜觀山不受，榮枯閒閱佛無言。

幡然卻悔從前誤，夜夜神鈴懶閉門【註五七】。

〈至宜溝驛〉

蕭條行色晚駸駸，十六州中作苦吟。

也憶嘉魚消宦況，獨憐老鶴識秋心。

峰懸月路樵人斷，水浸城根驛樹深。

漸近故鄉憂更切，梅花石洞鼓鼙音【註五八】。

〈友人濟源山水約〉

聞道丹書在沈寥，喜君許我聽吹簫。

五雲不散陽臺匝，萬谷長奔濟瀆朝。

蓼窟白猿嗔野史，竹籃紫杏愛仙樵。

將來儻出人間世，笑弄若華看無潮【註五九】。

其中〈夜中言〉首句「茫茫四海欲安之」中的「安」字，冊頁中原書作「何」字，其旁則訂正為「安」字。而在〈即吾園示僧〉中，亦漏書「秋深花落知溪晚」的「落」字，此首之末則補書有「落」字。

緊附於〈即吾園示僧〉一詩後，王鐸還書有一段識語，說明其在寫此字之時，因有稚子在旁嬉鬧，以致多處出現脫字的情形，其言曰：

書時，二穉子戲於前，噉啼聲亂，遂落數「：」【註六十】，如「龍形萬壑」等字，亦可矜也。書畫事須深山中、松濤雲影中揮灑，乃為愉快，安可得乎？王鐸漫識。

而在〈友人濟源山水約〉之後，另有一識語，叙說他書此詩翰的緣由和景況：

道末先生學通天人，養多玄秘，心服其為人中龍象也。予曾書一卷，被盜竊去，因再書此，今裱成，再奉以贖遺失之愆，知道翁必大笑也，河南王鐸具草求正之。月來病，力疾勉書，時絕糧，書數條賣之，得五斗粟，買墨，墨不嘉耳，奈何【註六一】！

王鐸所附書的這四首七律，當均為崇禎十四至十七年時的舊作【註六二】，其被輯書於此的原因，乃用以表達其對歸隱山林的殷切企盼。王鐸當時在京的生活既然如此困苦，而他在家鄉孟津仍擁有田產，無怪乎他興此告歸之意，但做為一位重要

的降臣，且其家人多在軍前或外放為官，清廷為監控方便，可能根本不許其還里。

王鐸於順治二年降清並隨多鐸抵京之後，或因聽聞舊識湯若望已於前一年十二月接掌欽天監成為新貴【註六三】，乃決定手書一卷相贈，以重新建立聯繫。不幸，此手卷尚未送出即遭竊。但王鐸在貧病交加的情況下，竟然還費心籌錢買墨【註六四】，為湯若望重書一卷，甚至將之裝裱，由於此事原非急迫，故可想見他當時頗亟於和分別多年的湯若望再續先前的交情，或許更期盼能獲得一些適時的濟助。

雖然王鐸在此四首七律之前，題稱「過訪道未湯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但此詩應為其崇禎十年至十三年間在京的舊作，故此「詩風意氣揚揚，毫無衰頹之態」【註六五】。王鐸書贈湯若望此一冊頁時，兩人應尚未重逢，此因二人如已晤面，湯若望很可能會從朋友的立場贈以相當數額的金錢調濟，那麼王鐸不致於在書此冊頁回報時，仍有絕糧的窘境。而若當時湯若望並不會有所表示，或僅以少數金額敷衍，那麼王鐸也不會在絕糧之餘，還籌錢買墨為不太夠朋友的湯若望書此。王鐸以此一舊作書贈的目的，或亦有讓湯若望追憶起先前交情的另一層用意。

由於王鐸自順治六年正月，開始以禮部尚書銜管左侍郎事，而當時欽天監凡遇有具題、行文等事，均須透過禮部【註六六】，故必然會與湯若望有職務上往來。再衡量王鐸當時絕糧的狀況，我們似可將王鐸書此詩翰的時間，縮限在其降清之後以迄順治六年年初之間【註六七】。

在王鐸的《擬山園選集》中，另收有〈東西洋湯子〉一詩：

別後十年泣塞鴻，遙傳震旦與天通。

蠻王盡禮諸神像，漢使空瞻異域風。

蛤蠣化居無種類，珊瑚指點向空濛。

玄宗自此長相演，萬古恢恢大治中【註六八】。

其中「震旦」為「中國」的梵語音譯，而「遙傳震旦與天通」句，或指的是順治四年八月信奉天主教的佛郎西國人初來廣東互市一事【註六九】。「蠻王盡禮諸神像，漢使空瞻異域風」句，則形容中國之人因此初聞歐洲各國的宗教與風俗。「蛤

蠟化居無種類，珊瑚指點向空濛」句中，則以「蛤蠟」形容受教化的眾民，以「珊瑚」形容指點迷津的湯若望。至於玄宗，在此則指當時許多西方國家所共同信仰的玄祕宗教（即天主教）。故王鐸很可能直到此時始與同在京的湯若望建立聯繫，亦即前述的詩翰應最可能書於順治二至四年間。

經查王鐸現存各作品的印記，發現至少有約二十幅，鈐蓋有此一書翰末尾所用的「王鐸之印」和「煙潭漁叟」兩方印，其中時間最早者，或用在其於崇禎十七年十二月任職弘光政權之時，最晚者則為順治八年三月【註七十】，此亦與前文對王鐸贈湯若望詩翰的年份判斷相合。

王、湯二人的初識，或不遲於崇十一年，此因時任禮部右侍郎的王鐸，應會由於職事的關連而與在曆局修改曆法的湯若望相識【註七一】。十三年九月，王鐸陞授南京禮部尚書，一直到順治二年始又重回北京。至於湯若望，則從崇禎三年抵京修曆以來，除崇禎十七年正月曾隨李建泰赴山西攻打李自成軍外【註七二】，其餘時間似乎均未離京。故兩人再度聚首的時間，即使計入頭尾之年，相隔應僅八年。此詩中所謂的「別後十年」，或只是取其整數以形容久未謀面的概略之辭而已。

此一冊頁在書贈湯若望的八首行書體七律之後，另有隸書體的五言律詩六首，分別題為〈禹峰言海外卜築〉、〈夜舟入內黃〉和〈雲齋、禹峰舟中談海嶼〉、〈談海嶼〉、〈談海〉、〈泊楚王鎮〉【註七三】。王鐸在末尾明白題稱此是崇禎十七年二月為「翼隆老社兄」所書的，而其上所鈐蓋的「王鐸」和「王鐸之印」，均不見於贈湯若望的詩翰中。

前述的翼隆和雲齋，其人均不詳。至於禹峰，乃彭而述的自號，彭氏為崇禎十三年進士，曾授陽曲令，後因丁母憂，遂終明之世不仕，滿人入關後降清，曾替洪承疇參贊軍務，累遷至雲南左布政使【註七四】。王鐸在崇禎十七年二月客寓劉尚信家中時，始初識彭氏，但兩人卻一晤定交【註七五】。

王鐸當時因避寇乃與彭而述等人攜手東行【註七六】，他們搭船自濬縣出發，沿衛河行經河南內黃縣北的楚王鎮（又名楚旺鎮），此故有〈夜舟入內黃〉和〈泊楚王鎮〉二詩之作，接著，又經過泰山、青州，而抵渤海邊。其時，王鐸和彭而述等人，已深感時局之不可恃，故在詩中屢興乘桴浮於海的想法。崇禎十七年三月九日，王鐸重被起為禮部尚書【註七七】，但尚未赴職，李自成已陷北京，於是王鐸與彭而述等人決定作「吳中遊」，「仗劍走東南曠野中」，往福王在南京新成立的朝廷

謀求發展【註七八】。

綜前所述，此一冊頁其實包含兩幅獨立的作品，不僅書寫的時間和對象不同，字體亦為一行、一隸，很可能在十七、八世紀時，始被收藏者合訂成一冊。由其上所鈐「雲谷葉氏家藏」和「南海葉氏雲谷家藏」兩印，可知此件曾為葉夢龍（一七五十一—一八三二）所藏。葉氏友人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和錢坫（一七四四—一八〇六）即於冊上有觀款。清末民初，此冊歸裴景福（一八五四—一九二六）的壯陶閣。民國三年，上海文明書局在刊行《王覺斯詩冊墨蹟》時，即借刊此作，該書於民國二十三年時已發行至五版。裴景福在民國十三年序刊的《壯陶閣書畫錄》中，亦曾收錄己所藏此一冊頁的原詩、題跋和鈐印的文字【註七九】。民國二十五年，王鐸此一書作流入葉恭綽（一八八〇？—一九六八）之手，此故在二玄社本中，即增見「番禺葉氏」、「恭綽長壽」等藏印。惟原作今存何人何處，則不知。

經考量前述條幅和冊頁的詳略情形，我們似可判斷輔大現藏的條幅較無可能為真跡，否則將難就冊頁中所出現的作者識語和落字情形，提供一自然的解釋。又，經仔細比對後發現，條幅末的「王鐸之印」，無論是筆畫的粗細或相對位置，均與王鐸其它作品所鈐蓋的同一印有些微差異。再者，以王鐸書藝的盛名，經過將近三百年的漫長歲月，條幅上竟然不見任何收藏家的鈐印，亦啟人疑竇。

由於方豪嘗稱王鐸贈湯若望之詩：「墨跡尚存，上海文明書局有影印本。原為長卷，陳援菴先生改印為直幅，饋贈友人」【註八十】，因知今輔大神學院所藏者，或為陳垣（字援菴）當時交印的底本，惜方文並未說明陳氏印此直幅的時間。此一底本很可能是透過嚮搨（或稱響搨）的方式臨摹出的【註八一】。由於嚮搨乃是以細筆描出各字的外框，最後再填以濃墨，此故條幅上的字跡，即顯得較乏神韻，而冊頁末尾所鈐的「煙潭漁叟」一方印，也因原件模糊不清而未被搨出。惟陳垣究竟是根據真跡抑或文明書局本所搨，則尚待考。如其是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始刊印此一詩翰的話，則極有能是向其友人葉恭綽借得所藏真跡後再嚮搨而成的【註八二】。



四、王鐸文友與湯若望間的交游

在王鐸的《擬山園選集》中，屢可見其與丁耀亢、薛所蘊、陳名夏、金之俊、龔鼎孳等貳臣詩酒相過從的情形，而他的這些文友們，均留有和湯若望交游的詩文〔註八三〕。如丁耀亢嘗作《同張尚書過天主堂訪西儒湯道味太常》一詩：

鬢髮竊停垂雙耳，渡海東來八萬里。

相傳印度浮屠外，別有宗門號天氏。

天氏稱天人主教，自謂星辰手所造。

因緣亦與儒釋同，不識天人原一道。

璇璣法曆轉銅輪，西洋之鏡移我神。

十里照見宮中樹，毫髮遠近歸瞳人。

亦有井中暗雷巧，激而上注及東鄰。

手握寸石能五色，照人炫惑皆失真。

鐘依漏而自擊，琴繁絃而自操。

造化雖小稱絕巧，童年不識陰陽竅。

老人九十顏如丹，駝腰高鼻古衣冠。

漢書烏譯皆不識，此亦大道非波瀾。

安得聃尼言化理，無用小技鑿肺肝〔註八四〕。

對傳教士所傳入的天主教、天文儀象、望遠鏡、噴泉、稜鏡、自鳴鐘、多弦琴等，均顯露出相當的好奇與仰慕。丁氏曾於康熙四年因撰寫《續金瓶梅》一書，被仇家告發書中有影射清人南侵一事，後因龔鼎孳等人的開脫始免罪〔註八五〕。

體部尚書胡世安和該部侍郎薛所蘊，亦曾於順治十三年應湯若望之邀共飲上賜的西洋酒〔註八六〕。胡世安因而賦有《道

未先生邀同行屋貳公飲和蘭貢酒。一詩記此事，其中行屋即薛所蘊的字，又因薛氏時任的侍郎一職為正卿尚書之副，故胡氏稱呼薛為貳公。而在薛所蘊所賦的〈湯先生招飲上賜和蘭貢酒〉一詩中，更對此一邀飲盛事有細緻的描寫，其文曰：

聲教被遐荒，和蘭重譯至。

方物多珍奇，不貴越裳雉。

維酒清且烈〔註八七〕，各國釀有制。

一種三器盛，四種十二器。

玻璃製精巧，燦燦文具。

罌實色互映，表裏如一致。

舟航天際來，蛟龍應所嗜。

扁鑰固重篋，三年得供御。

異人湯先生，上前全拜賜。

持歸通微堂〔註八八〕，馨聞莊達暨。

叩友二三人，相延就客次。

啟罌懼命酌，開樽心已醉。

珀光與珊瑚，精采難逼視。

甘露和瓊液，不知何位置。

盈盈異香浮，霍爾消積滯。

平生耽麴蘖，市酤甘酣寐。

豈知天壤寬，海外有此異。

譙樓笳聲疾，嚴城將欲閉。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醜然促歸輿，仰嘆文德備【註八九】。

由詩中的「叩友二三人，相延就客次」句，知若望當時似僅邀胡、薛二人為座上客，顯見他們之間的交情或非泛泛。

又，薛所蘊嘗撰有〈湯道末先生園中水石歌〉一首，敘述湯若望居所的景緻，歌曰：

先生海外好奇者，重三十譯來過崑崙下【註九十】，無數名山大水堆心胸，卻向高師放出，寄在一畝園林中。園中有井二丈餘，不假綆索升作渠，噴射方塘如風雨，龍吟虎嘯盈兩耳【註九一】。繞塘怪石多氣色，離奇共水爭標格，或嶽立而矜莊，儼然束帶搢笏丈人行，或嵌空而玲瓏，翻若靜女窈窕，宛爾驚鴻與游龍。時來問道先生側，便如跳出長安陌。心疑此水此石不是塵世物，何其升降于無形，崢嶸而突兀。先生一身備天體，仰探星經之奧，俯窮地紀之理，開闢以來，日月指諸掌，手弄潺湲，足躡雲跟，時時栖心洪濛上。何時頓了婚嫁緣，常侍先生水石邊。庶幾撇卻緇塵一萬丈，依稀枕漱三山巔【註九二】

由其中「時來問道先生側，便如跳出長安陌」和「何時頓了婚嫁緣，常侍先生水石邊」句，更知薛所蘊不僅與湯若望過從甚密，甚至曾有入教之想。又，此一庭園佈置的奇巧瑰麗，或亦令人有若望「頗厚自奉」的印象【註九三】。

至於陳名夏、金之俊和龔鼎孳等三人，亦與湯若望相熟。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城，陳名夏就曾避居宣武門的天主堂內，原本欲投縋自盡，但為若望所阻，傳說陳名夏還打算向湯若望學習煉金術，但未遂【註九四】。金之俊和龔鼎孳則曾於順治十八年同以「通家侍生」的自稱，撰文賀湯若望的七十大壽【註九五】。龔鼎孳還嘗贈詩湯若望曰：

先生奧學貫人天，南極星輝綺里年。

八萬路趨丹闕迴，五千言就谷神全。

忠深獻納傳封事，道似羲文啟後賢。

慚愧小儒難蠡測，也容進履圮橋前【註九六】。

其中「忠深獻納傳封事」，應指湯氏建議以已出過天花的玄燁接掌大位一事，龔鼎孳在壽文中也稱湯若望曾「直陳萬世之大計」，應亦讚許的是此一功績【註九七】。

王鐸仕清時的貳臣同事們，還有許多與湯若望有往來者，如順治六年正月和王鐸同任《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官的弘文院學士劉肇國，即曾於順治七年造訪湯若望，並應邀為其撰《天主新堂記》，文中有云：「治曆者，先生久留之故；傳教者，先生遠來之故……迺今以曆法特聞，不知曆法僅其緒餘也」，敏銳地點出湯若望來華的動機【註九八】。又如曾與王鐸在順治三年同獲賜朝服的王崇簡，亦曾在順治十八年以「通家侍生」的自稱，撰文賀湯若望廕孫入監【註九九】。

清初，湯若望在士大夫間的布教活動，雖然並不十分成功，但他為提昇天主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並增進教會的影響力，仍廣為交接各階層的知識份子。此故除了前述的王鐸和其文友之外，如吳偉業、魏裔介、徐元文等仕清漢官或方以智、黃宗羲等明朝遺民，亦留有與湯若望酬贈的文字【註一〇〇】。湯若望當時並成功地以其遠人、奇士和高官的綜合身份，塑造出一名人的形象，因而如布衣談遷於順治十一年北游至京時，即油然而興造訪湯若望之念【註一〇一】。

五、結論

從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斷定輔仁大學神學院所藏題為王鐸書贈湯若望詩翰的條幅，並非王氏的真跡，而是陳垣請人嚮搨的摹本。由於湯若望是明清之際傳教士中的佼佼者，而王鐸其人亦大有名氣，陳垣或出自研究教史的濃厚興趣，乃摹印此一作品贈送友人。但當時可能為印製上的方便起見，即在嚮搨時將原本的冊頁格式改成了條幅。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因政局逆轉，而當時教會中人或已不知此一條幅的淵源和真偽，於是輾轉將其自上海徐家匯經菲律賓運送來臺。

雖然王鐸此一書作屢為先前許多學者提及，但多不曾對其內容有所闡述，亦不曾對王氏書就此一詩翰的時間、背景和目的做一較深入的探討。經析究王鐸的生平事跡後，筆者以為其《過訪道未湯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七律四首，原或作於明末。順治二至四年間，尚在京候用或甫授閒官的王鐸，在貧病交加的情形下，即以此一舊作書贈已成新貴的湯若望，希望能在別離多年之後，再續先前的交往，而王鐸在跋中對自己窮困景況的描寫，或亦有期盼湯氏調濟的間接目的。

除了王鐸之外，當時許多仕清的貳臣（如陳名夏、金之俊、龔鼎孳、魏裔介、胡世安、薛所蘊、劉肇國、王崇簡、丁耀亢等）亦留有酬贈湯若望的詩文。這些人幾乎全以進士出身而在明廷任官，甚至位居要津，彼此間更屢見締結姻親的情形。

滿人入關之後，此一團體中人為延續其官宦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很快地投降新朝，並為維持其自身權位和新政權的穩固而盡心盡力，至於其子姪們，除獲蔭官者外，亦有頗多經由科舉的途徑而成為統治階層的骨幹【註一〇二】。

在耶穌會「知識傳教」策略的引領之下【註一〇三】，湯若望從明季起就一直努力與士大夫交結。滿人入主中原之後，湯氏為維護天主教會的利益，立時輸誠，並獲派管欽天監監正事。自此，湯若望即從一位漢官社群的圈外人，轉而成為貳臣群體中的重要份子。他不僅與這些漢人貳臣們詩酒往來，更嘗在政事上相互合作，如他曾於順治九年為配合大學士洪承疇和陳之遴的主張，而假借星象示警，以疏諫皇帝出關迎接達賴喇嘛的舉動【註一〇四】。

湯若望雖為一外國人，但在同為貳臣的漢官心目中，精通漢語且已十分華化的他，應遠較漢人新貴們更容易被認同。且湯若望並不刻意將自己營造成傳教士的形象【註一〇五】，做為一清廷的臣僚，他除積極爭取封贈和品級上的恩榮之外（部分是為了揚教的目的），亦協助義子潘盡孝出任鑾儀衛治儀正，其義孫湯士弘也獲特旨蔭監【註一〇六】。這些均在顯示他已相當程度地融入了中國的官僚文化當中。

對位居高官的湯若望而言，他所談論的海外珍聞異事或所介紹的西方物質文明，頗能引起同僚興趣，並因頻繁的交往而有結為知己者。但對傳教士身份的湯若望而言，他所欲介紹的天主教教義，卻不太容易取代儒學在這些漢官心目中的地位【註一〇七】，此故清初的上層士大夫中，入教者並不多見【註一〇八】。事實上，湯若望在當時最被認同的形象，應是一盡忠職守的老臣【註一〇九】，或是一學行俱佳的高士【註一一〇】，而非一汲汲於度人的傳教士。

湯若望與中國士大夫間的往來，即多僅止於此一社交的層次，而不曾提昇至思想或宗教方面的深入交流，因此王鐸雖結納身為天主教傳教士的湯若望，但他也與僧道們保持密切的關係，甚至嘗起意欲在其家鄉建一佛寺，亦曾經著道衣、道冠以學道【註一一一】。此外，如金之俊、龔鼎孳、魏裔介、胡世安、王崇簡、吳偉業、徐元文等人，雖亦留有詩文記其與湯若望交游之事，但我們在《大藏經》中，同樣也可見到他們為佛教人士所作的序【註一一二】，其中龔鼎孳和徐元文還自稱為「法弟」，金之俊更明白自署為「雲棲弟子」，而雲棲即晚明四大僧之一的蓮池大師（又名株宏和尚），他曾與天主教人士有過激烈的辯難【註一一三】。至於曾摹印王鐸書贈湯若望詩翰的陳垣，雖長期與天主教中人保持密切關係，且因執掌輔大而承受

周遭人士冀盼其入教的強大壓力，但他卻遲遲未領洗，並在中共統治大陸之後，成為一位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員【註一一四】。王鐸等人與陳垣所處的時代，雖然相隔約達三百多年，但前列諸人對不同宗教的容納與興趣，以及後者對信仰的漠然，卻多少共同反映出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對宗教的態度，在他們的心目當中，儒學或政治所佔的比重，往往遠遠超乎宗教之上。筆者感謝鐘鳴日 (Nicolas Standart)、李東華、蔡雄祥、呂正惠、川原 秀城、安雙成、顧衛民、王汎森、邢義田諸位先生以及輔仁大學神學院圖書館，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所提供的協助，並特別謝謝評審委員對此文內容的許多寶貴批評與意見。本研究受國科會「楊光先與反西教」計劃 NSC 81-1103-01-H-007-022 支助。一九九三年七月，初稿完成於風城脈望齋，時逢王鐸誕生四百週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修改定稿。

附錄一：《擬山園選集》版本介紹

臺北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有王鐸《擬山園選集》乙種，凡五十四卷十五冊，臺灣學生書局曾於一九七〇年將此本景印出版，一九八五年又重印，是目前最易獲見之本。王鐸季弟鏞在書前的序文中有云：

余長兄覺斯……詩文典碩豐昌……其卷帙浩繁，約有萬卷，裝潢牙籤，凡五十餘帙，其壽梨也。一舉金閭，再鑄白下，余令崑山時，復鍍之署所。茲癸巳秋，仲兄仲和與余假寓吳門，再取成書，詳為校閱，益以新篇，從石齋（筆者按：指黃道周）、鴻寶（筆者按：指倪元璐）、太青（筆者按：指文翔鳳）諸先生之所選定者，僅存十之四五，彙為一集，名曰：「擬山園選」，徵取良工，重為剞劂……癸巳亥月，胞弟鏞子陶氏題於虎丘僧舍。

其中吳門即江蘇吳縣，別名金閭，與崑山縣同屬蘇州府，而白下則指江寧（今南京）。因知王鐸的詩文別集，曾於吳縣、江寧和崑山先後刊刻【註一一五】，而此本則為順治十年王鐸仲弟鏞（字仲和）和季弟鏞（字子陶）在蘇州吳縣重刊之本，當時雖曾增添新的內容，但原刻本也被大肆刪削。

此本在各卷卷首均註明原選閱之人，但其中的內容則已有增改，此故如在七言律詩部分的卷六，雖前題為倪元璐（卒於禎十七年）閱，然而此卷中的（匠先新造水亭）和（丁亥六月贈牧齋）二詩，卻均為王鐸順治四年的作品。又，此本各卷所

收之詩，並未依年代先後排序，令各詩創作時間的判斷頗為困難。

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收有此書一微卷，原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其目錄題曰：「清順治十五年，王鏞、王鏞刻本」，共七十五卷三十六冊，封面書名為「王覺斯先生擬山園選集」，板心則僅稱「擬山園選集」。此本書首所收二十一篇文章的書板和排序，與央圖藏本完全相同，但正文則多了七種文體（含賦三卷、騷一卷、今樂府一卷、銘一卷、五言絕句二卷、七言古詩十二卷以及七言排律一卷，凡二十一卷）。至於其餘五十四卷所使用之板，亦均同於央圖藏本。由於此本書首僅見有王鏞於順治十年所寫的序，不知北圖因何定之為順治十五年刻本？

又，筆者在臺北臺灣大學研究圖書館中，還見到此書另一刻本，該館目錄上稱：「明崇禎間刊本，七十二卷，四函二十四冊」，惟經詳細計數後，發現其總卷數應為七十五卷，而其正文與北圖七十五卷本所使用之板完全相同，但其前序各文所用的雕板則不同，且篇數亦少了六篇。由於臺大藏本的內容頗多記順治年間事，且書首收有順治十年王鏞所寫的序，因知該本絕不可能為明末所刊。

經查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目，發現該館還藏有另一順治十年王鏞和王鏞刻本，共八十一卷二十五冊【註二一六】，而《清代禁燬書目補遺》和《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中，亦記有八十二卷本各一【註二一七】，這些均較筆者所見三本的卷數為多。由於王鏞此書間有涉及違礙的內容，故筆者懷疑當時編印或收藏之人，或即根據各自的判斷，而加以刪削編排，以致同一版本卻出現有不同卷數的情形。惟因各本中均無總目，且各文體的卷數均重新起算，故對排序並不太造成困擾。

經比對後發現，臺大七十五卷本的編藏者較為注意前序內容的違礙與否，而央圖五十四卷本則較重視內文。此故，如在七十五卷本的《靖嶸山房賦》中，有「戊寅歲莫，虜破我六十餘城」句（賦，卷二頁一二），記清兵（以「虜」稱之）於崇禎十一年入關攻明一事，而在五十四卷本中，所有的三卷賦即全數被抽去。至於臺大藏本較它本所少的六篇序文，其中文震孟和姚希孟兩序，或因其文字分別與何吾驕和馬之駿序幾乎全同（原因待考），以致被刪。張國維、張鏡心和楊觀光の序，則或因其中分別以「上」稱呼崇禎帝、以「本朝」稱呼明朝、以「我明」稱呼明朝而被刪。陳鑑於順治九年所撰の序，則可能是因其在入清後仍使用明諱「繇」和「雒」等字而被刪。由於此書各本並未能完全消除干礙之處，以致在乾隆時仍遭到禁

燬的命運【註一一八】。

除前述各本之外，王鐸現存的詩文別集，還有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的《擬山園初集》十七冊，內閣文庫藏的《王擬山園集》殘本（存卷三一—三三）【註一一九】，北京圖書館藏的《擬山園詩稿》不分卷一冊、《擬山園書札》一冊等【註一二〇】，惟這些書筆者均未得見。

附錄二：琅華館非指永寧的張氏別墅

一九五八年，在河南洛寧縣（古名永寧）的張氏別墅中，曾發掘出十二方王鐸為張鼎延所書《琅華館帖》的刻石，目前一般多以此一別墅即琅華館的所在【註一二一】。然而此說頗和現存的文獻記載矛盾，如清人楊賓在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自序的《鐵函齋書跋》中，撰有《琅華館王覺斯細楷》和《裴公琅華館王覺斯帖》兩則文字【註一二二】，其中「琅華館」一詞均是與王鐸之名連用的。且王鐸在順治二年題其自藏的宋人李成《寒林圖》時，嘗曰：「琅華館藏，乙酉識，孟津王鐸家珍」【註一二三】，亦明白顯示琅華館應為王鐸的室名，而非指永寧的張氏別墅。

事實上，筆者在臺大或北圖所藏的七十五卷本《擬山園選集》中，發現王鐸嘗撰有《琅華館賦》一文，稱：「己卯、庚辰間，余於北畿築一室……題曰：琅華。夫《道藏》琅華乃逍遙出世之趣，余居京塵，未及歸山，安敢慕於道林歟！……余乃薙艸買花，列於館外，焚香彈琴，娛於館中」【註一二四】，更確定琅華館即王鐸於崇禎十二、十三年在北京所築的寓所。此故他在順治三年三月酒後寫杜甫詩時，末尾即曾明白題曰：「書於北都琅華館」，此處北都即指北京【註一二五】。

雖然琅華館原在北京，但王鐸後來流寓四方時，卻仍舊有使用此一室名者。如其崇禎十四年的作品中，即見有此名【註一二六】，當時王鐸乃在故里孟津丁憂。十六年十一月，王鐸亦曾書有《琅華館信古擬帖》【註一二七】，其時他正避居輝縣，因知琅華館應非專指一固定的建築。

註釋

- 【註一】：清·楊賓《鐵函齋書跋》（康熙四十七年自序本），卷四頁，收入《百部叢書集成·涉聞梓舊》（臺北：藝文印書館）。
- 【註二】：清·王鐸撰，黃道周等選輯，《擬山園選集》（臺灣學生書局重印順治十年刊本，下文中如未特別註明，即用的是此本），前序。此書中各文體的卷數均從頭起算，有關各版本的討論，詳見附錄一。
- 【註三】：清·薛所蘊，《桴庵詩》（北京圖書館藏順治十二年刊本），前序。
- 【註四】：談遷，《北游錄》，〈紀郵下〉，頁九六，收入《明清史料彙編》第七集第二冊（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二）。
- 【註五】：本節中除特別加註之外，其餘均請參閱Mingshui Hung, "Wang To,"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it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2, pp. 1434-1436. 村上三島主編，《王鐸の書法》（東京：二玄社，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北京：榮寶齋，一九九三）。
- 【註六】：王鐸曾作有〈壬辰予支干一周〉詩乙首，收入《擬山園選集》，五言律詩，卷一四頁二四。
- 【註七】：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頁一六〇—一六一。
- 【註八】：清·談遷原撰，張宗祥標點，《國權》（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卷九七頁五八五一。
- 【註九】：高文龍，《〈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編纂札記三則》，《中國書法》，一九九二年第四期，頁二八—二九。
- 【註十】：高文龍，《〈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編纂札記三則》。
- 【註十一】：談遷，《國權》，卷九七頁五八七八及頁五八八二。現今有關王鐸的傳記中，多僅稱其父母之一是在是年亡故，但經查《擬山園選集》的五言排律部分，王鐸曾連續有詩數首（卷一頁七一—二），記其於崇禎十三年冬自北京返里的情形，中有一首即名為〈哭父〉，因知他當時乃丁父憂。
- 【註十二】：王鐸曾在壽友人詩的序中稱：「予壬午寇隨吾津，仇離無家，道經桃源，輪中內子又病殞焉」，其中壬午歲即崇禎十五年。《擬山園選集》，五言古詩，〈壽凝之〉，卷一頁一四。
- 【註十三】：參見高文龍，《〈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編纂札記三則》；《擬山園選集》，五言律詩，〈秋始抵里，苦無家，借居輝邑〉，卷一三頁一八。
- 【註十四】：《擬山園選集》，彭而述前序；〈居潛〉，五言律詩，卷二二頁二—三。
- 【註十五】：談遷，《國權》，卷一〇〇頁六〇三八，崇禎十七年三月丁酉條。
- 【註十六】：時人頗多相信此人真為太子，但亦有稱其乃由一名為王之明者所假冒，然而不論其真偽，王鐸自從崇禎十一年短暫擔任東班侍從後，或即不曾再見過太子，無怪乎黃道周即疑其「無由別東朝長少儀表也」。參見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

四），卷一—四；清·黃道周著，陳壽祺重編，〈黃漳浦文集〉（荷蘭萊頓大學藏道光間刻本），卷三二頁三—四。

【註十七】：滿人因不承認南明政權，乃授以其在崇禎末年被擄而未任的禮部尚書銜；〈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卷二四頁八，順治三年正月乙亥條。

【註十八】：〈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二六頁一五，順治三年六月甲辰條。

【註十九】：〈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三二頁四，順治四年三月丙辰條。

【註二十】：此故王鐸在〈悼段姬〉一詩中有「三年燕市酸風緊」、「無端素旆去都門，閨月翩翩過衛源」等語；〈擬山園選集〉，七言律詩，卷五頁二〇。

【註二一】：〈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二頁二，順治六年正月丁卯條；卷四二頁六，順治六年正月戊寅條。

【註二二】：〈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六三頁五—六，順治九年三月乙亥條；卷六三頁九，順治九年三月己丑條。

【註二三】：福本 雅一在〈王鐸の書法・條幅篇〉的〈王鐸の生涯とその時代〉一文中（頁二四八—二五九），嘗整理出王鐸的世系圖，惟其中僅列出五子，至於王鐸之父王本仁和祖父王作庠之名，亦在圖中遺缺。參見〈擬山園選集〉，五言古詩，〈喪第四子無技〉，卷六頁一九；五言律詩，〈喪幼子無爭〉，卷一三頁三；七言古詩，〈西澤歌—為第十子琬作瘞……〉，卷二二頁七—八；（北京圖書館藏本）；清·趙擢彤修，宋縉纂，〈孟津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嘉慶二十一年刊本），卷七頁一八一—九。

【註二四】：〈擬山園選集〉，五言古詩，〈紀往蹟〉，卷三頁六一—九；五言律詩，〈哭第三女〉，卷一三頁一三。

【註二五】：王鐸在〈琅華館帖〉末尾有一跋曰：「是帖皆予與中丞葆一年伯、玉調親家往還贖也。中間天政婚僅一二小札及遊金門山有韻之語……辛卯三月十四夜」，其中玉調即王鐸的親家張鼎延，天政則為其婿之字。

【註二六】：村上 三島，〈王鐸の故郷—河南省をねて〉，收入〈王鐸の書法・琅華館帖〉，頁一。

【註二七】：參見高文龍，〈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編纂札記三則。

【註二八】：王鐸在〈哭內子馬淑人〉一詩中，即有「幼子倏然啼，曰欲求其母」句；而其妻馬氏乃於崇禎十五年過世；〈擬山園選集〉，五言古詩，卷一頁一一二。

【註二九】：王鐸家族在清朝出仕的情形，請參閱清·徐元燦等纂，〈孟津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康熙四十八年增補本），卷二；趙擢彤修，宋縉等纂，〈孟津縣志〉（嘉慶二十一年刊本），卷七—八。

【註三〇】：高文龍，〈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編纂札記三則。

【註三一】：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頁四。

【註三二】：劉正成，〈王鐸書法評傳〉，收入《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頁七一八。

【註三三】：〈擬山園選集〉，五言古詩，卷五頁一六。

【註三四】：此見馬之駿為《擬山園選集》所寫的前序。

【註三五】：〈王鐸の書法·琅華館帖〉，頁二二四—二二六。

【註三六】：〈王鐸の書法·條幅篇〉，頁一三八及一六一。赤箭為蘭科植物，其根可供藥用，王鐸在此即藉柳公權向人求取三、五兩赤箭以扶衰病之語，間接向獲贈書作之人求取饋贈。

【註三七】：〈擬山園選集〉，七言律詩，卷九頁二二。其中汧邪指地勢低下的田地，初耕地翻草則曰笛。王鐸生平在「北地」為官的期間有三：一為天啟二年至五年間；一為崇禎十年至十三年間；一為降清以後。其中天啟年間，他才初進翰林院，開始步入宦途，故應無歸耕之慨。而崇禎十二、三年間，他在京築琅華館（見附錄二），因知當時的景況並不差。故此詩應最可能為順治年間所作。

【註三八】：〈擬山園選集〉，七言古詩，卷五頁一九—二〇（北京圖書館藏本）。

【註三九】：〈擬山園選集〉，七言古詩，卷六頁八一—八二（北京圖書館藏本）。

【註四〇】：錢謙益在其所撰的《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中，有云：「人曰公之品，逸而端，生平規言矩行，動止有常。既入北廷，頽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參見氏著《牧齋有學集》，卷三〇頁四一七，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七九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

【註四一】：漆書應指的是西洋文字。談遷嘗形容在湯若望居處所見的西洋書籍和文字曰：「其書疊架，繭紙精瑩。劈鵝翎注墨橫書，自左而右，漢人不能辨」；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四六。

【註四二】：「他山鳥獸」和「異國琳球」乃分指外國進貢的各種珍禽異獸和自鳴鐘、日晷等儀器。談遷曾於順治十一年造訪湯若望，雖然其時王鐸已逝，但他的觀察或仍有助於我們了解湯若望的生活情形。據談遷的記載，在湯若望居處的西側，即設有飼養進貢大象的象房一座，「舊象十有七，新象三，俱黎色。象奴命之呈技，隨命隨穎，無不各肖。越朝日列仗，視秩科為差，疾則代，傷人則杖或貶秩，終不敢越位」。參見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四六；陳綸結，〈讀談遷《北游錄》兼述順治時代之湯若望〉，收入一九九二年五月於德國St. Augustin舉行的「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1592-1666)」會議論文集，出版中。

【註四三】：此處「殊方」指異域，而「餘艘」則為渡海涉川的大船。湯若望曾對吏部文選司郎中范光文曰：「西洋舟深十三丈，凡五層，最下一層皆大木，載土為基，三、四層積沙，曲折為水道，凡浣濯汗垢，經沙曲折至下已清，不可飲，可以汲滌用，海舟積淡水為難。香山與海止深七丈，大舟不可至，浙

東海尤淺，西舟不能泊進也」。參見清·彭孫貽，《客舍偶聞》，頁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四六冊（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九）。

【註四四】：此句或形容的是西洋劍，王鐸亦曾珍藏有一把，嘗作詩記曰：「磊落殊方至，金精閃爍存。蛟皮何用淬，鵬尾未曾昏。大海神光注，群番目力捫。漆衣開五道，繡串製雙門。無蝕花成體，疑龍水作魂。春坊字已炤，老魅息全吞。華土不須拭，江心那敢翻。幾能甘睡背，奚啻奉昆侖。慎處憐藏器，看時念舊恩。百季知我者，不向此中論」，但此劍於稍後被盜；《擬山園選集》，五言排律，卷一頁七及卷三頁五。

【註四五】：此句或用的是晉人蘇耽的典故，傳說蘇氏種橘作井，大疫時，以之全活鄉人千百人；參見程允升原著，周達用增訂，《新增幼學故事群芳》（荷蘭萊頓大學藏清代文德堂刻本），卷四頁一四。

【註四六】：湯若望在明末曆局中即收有不少中國籍弟子，入清後，欽天監中的監官，亦多從他學習天算。鴻濛原指宇宙形成的渾沌狀態，在此即用以為天文曆算之學的代名詞。

【註四七】：湯若望居所書架上有關醫方器具的書籍頗多，而玉衡則泛指天文儀器；談遷《北游錄》，〈紀聞上〉，頁二七八。

【註四八】：湯若望對製藥相當有興趣，嘗製延生保命丹，合藥凡二百六十種，每種各三斤。又，談遷嘗形容六十有三的湯若望，「霜髯拂領」。參見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四六；〈紀聞下〉，頁三七〇。

【註四九】：談遷嘗形容湯若望所藏之西洋畫曰：「繪詭異，供耶穌畫像，望之如塑」、「其畫以胡桃油漬絹抹藍，或綠或黑，後加采焉。不用白地，其色易隱也。所畫天主像，用粗布，遠睇之，目光如注，近之則未之奇也」。參見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四六；〈紀聞上〉，頁二七七—二七八。

【註五〇】：談遷嘗稱湯若望住所的樓上有一琴，「琴以鐵絲，琴匣縱五尺，橫一尺，高九寸，中板隔之，上列鐵絲四十五，斜繫於左右柱，又斜梁，梁下隱水籌，數如弦，綴板之下底，列雁柱四十五。手按之，音節如譜」；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四六。

【註五一】：錕鍔在此或指五色燦然的彩石，利瑪竇入華時亦曾攜來；艾儒略著，向達校，《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北平：上智編譯館，一九四七），頁六。

【註五二】：《擬山園選集》，五言古詩，卷三頁三一六。

【註五三】：《擬山園選集》，七言古詩，卷一〇頁二〇（北京圖書館藏本）。

【註五四】：田宮 文平撰，張鐵英譯，〈王鐸對日本昭和後期書法的影響〉，《中國書法》，一九九二第四期，頁三四—三九。原文發表於《墨》，第九七號。

【註五五】：在《擬山園選集》中的詩題為《過訪西洋湯子道登覽聞海外諸奇》，且僅收錄第一首（七言律詩，卷六頁一一）。

【註五六】：《擬山園選集》，七言律詩，卷二頁一二。其中「蒙莊曳尾」一語，用的是《莊子·秋水》上的典故，莊子為蒙人，故稱蒙莊，「曳尾」則以莊子見

神龜死後留骨楚王廟堂為例，喻人與其出仕受爵祿束縛，不如像一隻「曳尾於塗中」的烏龜般，安於貧賤但卻逍遙自在。

【註五七】：《擬山園選集》中的原詩題為《即吾園示無我》，無我為僧名，吾園則為王鐸舊時讀書處，原詩共三首，此處所收為其中的第一首（七言律詩，卷二頁二一—三）。

【註五八】：《擬山園選集》中所收此詩的詩題為《至宜溝》而《十六州中作苦吟》一句則作「磁水州中作苦吟」（七言律詩，卷一頁二四），磁州屬直隸廣平府。

【註五九】：《擬山園選集》中所收此詩的詩題為《自玉濟源山水約》（七言律詩，卷一頁二四—二五），自玉為王鐸友人，姓名不詳。

【註六〇】：王鐸習慣在所漏之字的右側書此符號，但《王鐸の書法·冊篇》中，則誤識成同前字的符號，亦即將此句錯讀為「遂落數數」。

【註六一】：在《王鐸の書法·卷子篇二》中，將之誤讀成「道未先生學通天，養多玄秘心眼，其為人中龍象也……」（頁二一六）。高文龍在《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的《作品考釋·贈湯若望詩冊》中，亦沿襲此誤（頁六〇五—六〇七）。又，在此一書翰中，各字的筆畫頗多蔭開的情形，應即是使用便宜墨的緣故。

【註六二】：高文龍，《作品考釋·贈湯若望詩冊》。

【註六三】：拙文《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收入吳嘉麗、葉鴻瀧主編，《新編中國科技史》（臺北：銀禾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〇），下冊頁四六五—四九〇；亦收入魯經邦主編，《第二屆科學史研討會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一九九一），頁一六一—一七六。

【註六四】：雖然許多文人有哭窮的習慣，但類此「時絕糧，書數條賣之，得五斗粟，買墨」的細節敘述，或不似矯情的編造。

【註六五】：高文龍，《作品考釋·贈湯若望詩冊》。

【註六六】：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二十九年序刊本），卷一六一頁一，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七三〇冊（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九三）。

【註六七】：高文龍在《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的《作品考釋》中，主張此一詩冊乃書於崇禎十四至十七年之間，惟其誤以王鐸在降清後的生活環境，絕不至於像款識中所說的那樣窘迫。

【註六八】：《擬山園選集》，七言律詩，卷六七頁二—二。

【註六九】：《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三三頁二二，順治四年八月丁丑條。

【註七〇】：參見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頁三六二—五六〇及頁六一四—六一七。

【註七一】：因明朝欽天監所從事的編製曆日、推算交食、選擇吉時等工作，均與禮部相涉，且監官的陞遷，亦俱從禮部考選查擬，再轉送吏部銓注；詳見明·李

東陽等纂，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卷二二三頁一一四。

【註七二】：談遷，〈國權〉，卷一〇〇頁六〇一九，崇禎十七年正月乙卯條。

【註七三】：除〈夜舟入內黃〉一詩外，其餘五首均可見於〈擬山園選集〉中（五言律詩，卷一四頁五一七），惟詩題稍見不同，如頭一首作〈期禹峰、雲齋海邊卜築〉，而〈雲齋、禹峰舟中談海嶼〉、〈談海嶼〉、〈談海〉三首則分別為〈雲齋、禹峰過舟中論海嶼〉一詩的第二至第四首。

【註七四】：清·孫灝等撰，〈河南通志〉（臺北：華文書局，光緒八年刊本），卷五九頁八八—八九。

【註七五】：〈擬山園選集〉，彭而述前序。

【註七六】：王釋的〈甲申行〉一詩中有云：「甲申春月離輝州，東行避寇夜啾啾……毛州又轉聊城裏……」；〈擬山園選集〉，彭而述前序；七言古詩，卷八頁一三一—一四（北京圖書館藏本）。

【註七七】：談遷，〈國權〉，卷一〇〇頁六〇三八，崇禎十七年三月丁酉條。

【註七八】：〈擬山園選集〉，彭而述前序；七言古詩，卷八頁二一一—二（北京圖書館藏本）。

【註七九】：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臺一版），卷一三頁二八—三〇。

【註八〇】：方豪，〈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管接〉，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一九六九年自印本），上冊頁二五五—二七二。此文初稿載於〈東方雜誌〉，第三九卷第五號（一九四三）。

【註八一】：明人李日華有云：「嚮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益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練，色沈暗，非此不澈也」；參見氏著〈紫桃軒雜綴〉，卷三頁六，收入〈李竹嬾先生說部全書〉（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刊本）。另參見中田 勇次郎撰，洪惟仁譯，〈談古法書的真蹟本〉，收入〈書道全集〉（臺北：大陸書店，一九八九），頁二〇—三一。

【註八二】：今上海圖書館等處尚藏有數封陳垣與葉恭綽往來的信函，陳氏在信中尊稱葉氏為譽老或退公（葉恭綽字譽虎，晚號退翁），因知兩人相熟。又由信中的內容，知他們屢相與論學並交換文獻資料；陳智超編注，〈陳垣往來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一四一—一四七。

【註八三】：參見方豪，〈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管接〉；岡本 さえ，〈氣—中西思想交流之一爭點〉，〈東洋文化〉，第六七期（一九八七），頁一一—三二。

【註八四】：湯若望是在順治八年二月至十二年八月間，加太常寺卿銜的，而在這段期間曾任六部掌印的張姓人士，有工部尚書張鳳翔和歷任刑、兵兩部尚書的張秉貞，與丁耀亢同訪天主堂的張尚書究竟為何者，待考。參見錢仲聯主編，〈清詩記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第四冊頁二二—六五；〈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一九八一），卷一七八頁六三三—六三四—六三五；拙文〈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收入〈歷史與宗教—紀

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四二一六〇，節要本亦見《中國文化》（北京），第七號，頁一六〇—一七〇。

【註八五】：參見袁世碩為《續金瓶梅》一書所撰的〈前言〉，該書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

【註八六】：湯若望當時乃是在擔任中荷貿易談判的通事之後，獲賜數瓶西洋酒的。參見《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〇二頁三一四，順治十三年六月丁亥條；郝鎮華，《湯若望與荷蘭使節初使清帝國》，收入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1592-1666) 會議論文集。

【註八七】：當時傳入的西洋酒中，有酒精濃度相當高者，如湯若望嘗過飲范光文，范氏自許酒量大，然而僅飲半杯，即「茫茫若睡鄉」，雖取粥醒酒，但仍需攙扶，始能登車還家；彭孫貽，《客舍偶聞》，頁九。

【註八八】：湯若望於順治十年三月敕錫為「通玄教師」，十二年二月，又獲御賜「通玄佳境」堂額。康熙帝即位後，因避帝名玄燁而奉旨改「通玄」為「通微」，此故原詩應作「持歸通玄堂」。參見拙文《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

【註八九】：《碑記贈言合刻》（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順治十八年刻本，編號為SH. 58），〈贈言〉，頁一五一—一六。

【註九〇】：湯若望來華時年方三十出頭。

【註九一】：談遷嘗記湯若望園中的噴泉曰：「中方池通銅鑿於井，井上轉鐵輪，則池水噴注如鈞突，至四、五尺」；《北游錄》，〈紀郵上〉，頁六一。

【註九二】：薛所蘊，《桴庵詩》，卷二頁四二—四三。

【註九三】：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四六。

【註九四】：談遷，《北游錄》，〈紀聞上〉，頁二七八。

【註九五】：《碑記贈言合刻》，〈贈言〉，頁一—三及頁七—一〇。

【註九六】：此詩收入《碑記贈言全刻》，〈贈言〉，頁一七。其中「也容進履圮橋前」一句，用的是張良在圮橋遇黄石公，故意墮履試之，後贈以《太公兵法》的典故，龔鼎孳在此謙言希冀湯若望亦能有以教之；《史記·留侯世家》（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卷五五頁二〇三四—二〇三五。

【註九七】：Alfons Vaih S. J.,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Cologne: J. P. Bachem, 1933), p. 209. 或見楊丙辰譯，《湯若望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第二冊頁三二五—三二六。

【註九八】：《碑記贈言合刻》，〈碑記〉，頁三一—六。

【註九九】：《碑記贈言合刻》，〈碑記〉，頁二二—二四。

- 【註二〇〇】：參見王淪生，〈「通玄教師」湯若望〉，《自然辯證法通訊》，第一五卷第二期（一九九三），頁六二—七六；拙文〈康熙朝時漢人士大夫對「曆獄」的態度及其所衍生的傳說〉，《漢學研究》，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九三），頁一三七—一六一。
- 【註二〇一】：談遷當時是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之聘入京的，而朱氏與奉教人士頗有往來，如湯若望即掌以西洋餅饋贈朱氏，談遷造訪湯宅或即出自朱之錫的安排；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六七。
- 【註二〇二】：如薛所蘊之子奮生，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河南通志》，卷五八頁九三）。彭而述之子始搏，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河南通志》，卷五九頁八—八九。事實上，當時許多遺民本身雖不出仕，但對其家子弟習舉業、取科第，則並不以為非；參見何冠彪，〈明遺民子弟出試問題平議〉，《故宮學術季刊》，第七卷第一期（一九八九），頁四一—六八。
- 【註二〇三】：張維華、孫西，〈十六世紀世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政策的演變〉，《文史哲》，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頁三—三三。
- 【註二〇四】：拙文〈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清華學報》，新二二卷第二期（一九九一），頁二四七—二八〇；日文本篇名為〈擇日の争いと「康熙曆獄」〉，伊東 貴之先生翻譯，〈中國—社會と文化〉，第六號（一九九一），頁一七四—二〇三；英文本篇名為“Court Divination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Kang-Hsi Era”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翻譯，Chinese Science，第一〇號（一九九一），頁一—一〇。
- 【註二〇五】：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二期（一九三八），頁一—二七。
- 【註二〇六】：拙文〈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滿文密本檔》，卷一三七頁一—二七九，此據安雙成先生漢譯本的待刊稿。
- 【註二〇七】：如康熙初年因替湯若望弟子李祖白所撰的〈天學傳概〉作序，而遭楊光先疏控免官的許之漸，在其序文中，雖稱許天主教的義理，但卻並不曾毫無保留地支持天主教，他在文中始終秉持著以儒學為本位的根本心態，並期許天主教最後能證明其學確然是與儒理相契合，許氏晚年更且皈依佛教。參見拙文〈張宸生平及其與楊光先間的衝突〉，《九州學刊》，第六卷第一期（一九九三），頁七一—九三。
- 【註二〇八】：臨終前領洗的大學士魏裔介，或為清初知名士大夫中極少數的奉教人士；參見拙文〈張宸生平及其與楊光先間的衝突〉。
- 【註二〇九】：拙文〈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
- 【註二一〇】：如王釋在〈喜答西洋道末〉一詩中，即形容湯若望曰：「世外逢清骨，獨難語默真。劍藏歸舊匣，藥驗待何人。親戚營三窟，乾坤愛一身。彈琴居峭壁，氣白海煙鄰」，其二：「道淵未易出，石室惱人行。寥廓玄經契，虛明慧草生。高眠星斗伴，遠駕鳳龍鳴。肉食為何事，槿花豈不榮？」。此詩或為順治初年王釋與湯若望在北京重逢後所作；收入《擬山園選集》，五言律詩，卷一五頁二三。
- 【註二一一】：《擬山園選集》，五言律詩，卷四頁二；七言古詩，卷八頁一四—一五（北京圖書館藏本）。
- 【註二一二】：如見《中華大藏經》（臺北：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一九六八），第二輯第一二六、一三一、一四四、一五七、一六〇等冊。

【註一一三】：如見查時傑，〈明末佛教對天主教的「闢邪運動」初探〉，收入《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一九九〇），頁四八五—五二九。

【註一一四】：民國十五年，曾任教育部次長並代理部務的陳氏，或以其在政教圈中的影響力、治天主教傳華史的傑出表現以及與教會中人的友好關係，而應聘擔任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校長，雖然許多人均以為陳氏為教友，甚至方豪亦曾於民國十六年因此事而去信相詢，但陳垣在覆信中則稱：「余數月前曾演講回教入中國歷史，人多疑余為回教徒。近為輔仁大學校長，人又疑我為天主教徒。不知我實一宗教研究者而已，不配稱為某某教徒也」。民國二十五年，方豪曾自于斌處聽聞陳氏即將領洗一事，然據陳垣的入室弟子柴德廣稱：「他（指陳垣）當輔仁大學校長多年，輔仁的天主教會年年為他祈禱，希望他能夠加入天主教，但是他們失敗了」，似乎陳氏始終不曾加入天主教。參見《陳垣往來書信集》，頁二八八及二九四；柴德廣，《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頁四八三。此部份有關陳垣的資料，多由臺灣大學歷史系李東華教授提示，李氏曾師事方豪。

【註一一五】：由於孫承宗為此書所撰的《叙王覺斯太史初集》，作於崇禎四年，而黃道周的《題王覺斯初集》，則作於崇禎元年，因知王釋的詩文別集，或初刻於崇禎初年，至於崑山本，應是王鑑於順治二年至五年間任縣令時所刻。參見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光緒九年刊本），卷五八頁一。

【註一一六】：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二四七五。

【註一一七】：參見福本 雅一，《王釋雜記》，收入《王釋の書法・冊篇》，頁二四六—二六三。

【註一一八】：參見福本 雅一，《王釋雜記》。

【註一一九】：參見福本 雅一，《王釋雜記》。

【註一二〇】：《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頁二四七四—二四七五。

【註一二一】：任博文，《王釋〈琅華館帖〉簡介》，《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頁一七一—一九。

【註一二二】：楊賓，《鐵函齋書跋》，卷三頁五及卷四頁一。

【註一二三】：何傳馨，《王釋及其草書詩冊》，《故宮文物月刊》，第五卷第二期（一九八七），頁一〇四—一〇九。

【註一二四】：《擬山園選集》，賦，卷三頁七—九。

【註一二五】：《王釋の書法・卷子篇二》，頁一〇七。王釋在《擬山園選集》裡有《再上三宿巖、入靜海寺》一詩（五言律詩，卷五頁一二），其中「白髮經三月」句下註小字曰：「北都三月十九日事」，顯然指的是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一事，因可確定「北都」即北京。

【註一二六】：王季銓、孔達合編，《明清畫家印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年臺一版），頁七九。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二卷 第一期

【註二七】：〈王釋の書法・卷子篇一〉，頁九〇―九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 Study On A Calligraphic Work
Presented To Adam Schall By Wang
Tuo —— Contact Between Han Officials
And Jesuits In Early Ch'ing China**

Yi-Lo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tudies a calligraphic work of Wang Tuo (1593-1652) which includes four poems written for the Jesuit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Judged from the life of Wang Tuo, this work is probably written during 1645-1647 in Beijing just after the surrender of Wang to the Manchu army. Wang Tuo's financial situation at the time is hard up. The reason that he presented this calligraphic work to Adam Schall is to try to obtain some economic support from this friend who has just become the director of th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As a high-level official, Adam Schall become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H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who served both Ming and Ch'ing courts. Many of his colleagues wrote poems or articles to him as a medium of social contact. To them, the best known image of Adam Schall is a very knowledgeable official and scholar, but not a missionary to preach a foreign religion.

Keyword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國天主教史

Jesuits 耶穌會士

Wang Tuo 王鐸

Adam Schall 湯若望

History of Ming and Ch'ing 史清史

History of Calligraphy 書法史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一 through 三〇.